



廉以护民 政系民心

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下》里说:“廉者,政之本也。”古往今来,百姓评判官吏,首看清廉。若官吏贪墨自肥、与民争利,纵使有万般功绩,也难获民心;若能戒贪止欲、洁身自好,以清廉守护百姓利益,纵使治政无惊天之举,也能赢得百姓的信任与称颂,让政绩在清风正气中彰显温度。

东汉“钱太守”刘宠,以清廉呵护会稽百姓安宁,让政声深植民心。《后汉书·循吏列传》记载,会稽郡百姓天性质朴,但在前几任太守治下,官吏横征暴敛,“吏发求民间,至夜不绝,或狗吠竞旦,民不得安”,山民“避吏如避寇”,甚至遁入深山。

刘宠到任后,“简除烦苛,禁察非法”,裁决冗吏,严束官员,明定赋税章程,下令属官“不得私人民宅、不得夜扰民生”,郡内很快政简刑清。后来朝廷征召他为将作大匠(约相当于后世工部尚书),山阴县五个老翁自若耶山谷前来,各携百钱相送,对他说:“自明府下车以来,狗不夜吠,民不见吏;年老遭值圣明,今闻当见弃去,故自扶奉送。”刘宠再三辞让,百姓苦苦相求,他只好从每人馈赠中各取一钱。当行至江广时,刘宠将钱投于水中,以示分文不取于民。

后来,这条江被称为钱清江,刘宠也留下了“钱太守”的美誉,这美誉包含的是百姓对其清廉爱民、政简刑清的由衷称颂。

清代张伯行被誉为“天下清官第一”,他以一生清廉的坚守,让江南百姓远离贪吏盘剥。康熙年间,江南财赋重地贪腐成风,张伯行历任济宁道、江苏巡抚等职,曾作《却赠微文》作为自己为官的准则:“一丝一粒,我之名节;一厘一毫,民之脂膏。宽一分,民受赐不止一分;取一文,我为人不值一文。”坚决拒收一切馈赠。有富商深夜送黄金百两请托办事,被张伯行厉声斥退,还下令杖责送礼者以儆效尤,同僚劝他通融,他答:“我为官,暂以清白自守,若受一钱,便与贪吏无异。”江南百姓颂其任官数年,“止饮江南一杯水”。

康熙五十年(1711),时任江苏巡抚的张伯

口碑是最好的政绩

——从百姓口碑看为官者的政绩观

王爱军

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云: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。”这一治政核心理念,在历代贤吏的实践中淬炼成最朴素的政绩准则——百姓的口碑,是检验政绩最公正的标尺,是衡量治绩最持久的丰碑。所谓政绩,绝非文牍陈词、章奏表议所能定义,而是关乎民生福祉、系于民心向背。华夏数千年治政史中,无数官吏湮没于岁月,唯有以民为本、躬身治政者,被百姓口口相传、立祠祭祀,其事迹跨越时空,其精神照鉴古今。

行不畏权贵,坚决弹劾两江总督噶礼在江南乡试舞弊案中收受贿赂、包庇贪官。虽遭噶礼反诬构陷,一度被停职审查,张伯行始终坚守正义。江南百姓自发聚于府衙请愿,高呼“请还张青天公道”,老者甚至愿“以死相保”。最终康熙皇帝为其昭雪,称其“天下清官第一”,这既是帝王的认可,更是百姓对其清廉的真心回应。

从刘宠的“一钱”到张伯行的“一杯水”,百姓对清廉官吏的称颂跨越千年。廉以护民,从来不是抽象的道德标准,而是不贪民财、不扰民生的具体践行;政系民心,从来不是嘴上的口号,而是以清廉守初心、以正气护民利的必然结果。唯有清廉自守,戒贪止欲,才能让政绩扎根民心,成为百姓口中的美谈。

勤以纾民 绩为民生

清代郑板桥《墨竹图题诗》云:“些小吾曹州县吏,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这份心系百姓的初心,是所有官吏的治政底色。政绩从来不是纸上的文章、嘴上的口号,而是深入民间、躬身实践的实际行动,是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,是把为民的实事办在实处。

明初方克勤任济宁知府,百姓由衷称颂他“活民者,方使君也”,其事迹载入《明史·循吏列传》。洪武四年(1371),方克勤赴任时,济宁历经元末战乱,田园荒芜、人口锐减,赋役繁重,百姓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。

方克勤秉持“民病不救,焉用我为”的理念,将纾解民困作为第一要务。朝廷征调民夫修城恰逢农时,他不顾被弹劾“独断专行”的风险,上疏直言:“百姓久遭战乱,亟待休养生息,农时一失,全年无收,恐生民变。”恳请缓征民夫以保农耕;农忙时节,他效仿李愬“尽地力之教”,亲至田间指导百姓改进耕作技术、推广高产作物,济宁当年便迎来丰收;他严禁官吏扰民,下令“民有讼,禁吏叱责”,自己巡察州县“杯水不肯受”,一件布袍穿十年,见老妇饥饿禀倒便脱袍相护、送粮纾困,更减免其三年赋税。济宁百姓编歌谣颂其德:“孰罢我役? 使君之力。孰活我黍? 使君之雨。”

一次,方克勤赴京师办事,百姓怕他不归,拦住道路,跪拜着为他送行,流泪说道:“使君去,吾民何待乎?”这份依赖与不舍,是百姓对他政绩最好的认可。

清代循吏牛运震任甘肃秦安、徽县,两当知县时,秉持“仆愿与秦安百姓分衣食甘苦”的初心,以躬身勤政纾解百姓疾苦。乾隆三年(1738),牛运震赴任秦安,面对“十年九旱、土地瘠薄”的困境,他跋山涉水勘查水源,开九渠引水灌溉旱田万亩,百姓赞颂“开渠如开天,引水如引福”。他亲制耒耜推广新式农具,为贫困农

户“称贷贩褐户,不求其息”,让百姓摆脱“靠天吃饭”的窘境。乾隆四年,秦安玉钟峡山洪壅塞河道,百姓危在旦夕,他闻报即“带备箕铁锹,星夜赶往灾区”,与民并肩奋战四昼夜开浚河道,水退后又“缘山步行,以钱米给灾户”。牛运震身兼三县政务,曾作诗描述自己的工作状态:“落日微心道,遥林风未收。簿书妨月夜,鞍马任朝秋。峡虎饥难卧,江猿晚易愁。一身三县宰,憔悴小甘州。”

乾隆十二年,平番县五道岷遭饥荒,时任平番知县的牛运震率先“捐粟二百石以赈”,亲往灾区散粮,“风餐露宿无倦色”,令无数黎庶得脱流离之苦,重获生息之机。百姓感念其恩,筹金相赠,被牛运震拒绝;百姓便“户出一文”制“万民衣”相送,他“受衣返币”,动情地说:“衣载民情,重于千金,受之无愧;财取民脂,轻于鸿毛,分文不取。”离任时,秦安百姓“攀辕卧辙,相送三四百里,哭声震野”。

从方克勤被百姓颂为“活民者,方使君也”,到牛运震离任时万民攀辕相送、声震郊野,历代百姓对官吏的称颂从不虚发,皆源于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民生实效。勤以纾民,是“凡民有丧,匍匐救之”的担当;绩为民生,是“民之所盼,我必行之”的答卷。唯有以勤为政、以民为本,把实事办在难处、把温暖送到心头,方能政声入民心、口碑传千古。

公以安民 治顺民意

“法者,天下之公器也。”治政的核心在于公正。官吏执掌一方政令,评判民间是非,唯有秉持公心、秉公处事,明断是非,锄强扶弱,让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,才能化解矛盾,安定一方民心。

《宋史·陈希亮传》载,陈希亮为官“严而不残”,是北宋著名循吏。他任长沙知县时,僧人海印国师勾结权贵、作奸犯科、侵占民田,陈希亮不畏权势,将其逮捕治罪,震动全县,百姓称其为“陈青天”。陈希亮调任零都知县后,当地巫师借祭祀搜刮民财、造谣惑众,还谎称有“红衣老人”降灾,陈希亮严令禁绝,“毁淫祠数百区,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”。离任时,当地父老乡亲哭着送他,说:“您要是走了,‘红衣老人’的灾祸又要来了。”陈希亮任开封府判官时,有禁军士兵遭主将诬陷,判了死刑。陈希亮顶住压力重审,“验问得冤状,卒免死,劾主将”,深得全军信服。陈希亮一生“法不阿贵,明而能断”“锄强扶弱,兴利除害”,百姓呼其为“白脸青天”,史载“所到之处,路有颂声”。

明代杨继宗两度任职云南,以公正安定滇地民心。据《明史·杨继宗传》及《滇系》记载,成化年间官场贪腐成风,云南地处边陲,吏治混乱,兵乱频仍,豪强欺压百姓,“民不堪其苦,多有流亡”。当地豪强倚仗与布政使有亲,“霸占民田千亩,欺压邻里”,反抗者或遭诬陷下狱,或死于非命。杨继宗就任后,刚正不阿、秉公治民,他不顾布政使

的说情,查实豪强罪证数十条,终将其绳之以法,为蒙冤者平反、归还百姓田产,更罢免不称职旧僚八人,整飭云南吏治。百姓焚香跪拜,呼为“青天”,民间有一首广为传诵的七言绝句赞曰:“天下谁能执中?三原王恕秉公;浙江陈选堪连并,更有山西杨继宗!”杨继宗的铁腕治吏,根植于自身的刚正不阿与清廉自持,就连权倾朝野的宦官汪直都不得不承认:“天下不爱钱者,惟杨继宗一人耳。”杨继宗以公正锄强扶弱、为民做主,让滇地百姓摆脱苛政之苦,百姓拍手称快:“杨公至,滇民安。”

从北宋陈希亮“刚正不阿、民无怨之”的“白脸青天”,到明代杨继宗“清风满袖、安定滇疆”的“杨公至,滇民安”,千百年间,百姓对公正官吏的由衷称颂,从来都源于心底对公平正义最朴素、最炽热的渴望。公正,是为官者的立身之本,更是安民兴邦的为政之要。唯有以公正为尺断是非、以公道为刃除奸邪,以公心为念护民生,才能让百姓在每一件事、每一次裁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,从而心悦诚服、倾心拥戴。

远以利民 功惠民祉

《论语·子路》云:“无欲速,无见小利。欲速,则不达,见小利,则大事不成。”治政亦是如此,一时的安民之功易做,长远的民生之利难求;表面的显绩虚名易取,根本的固本之策难行。为官者唯有立足地方根基,着眼百姓长远,摒弃短期功利思维,多做打基础、利长远、惠后生的实事,才能让政绩融入一方水土,惠及世代百姓。

清代汤斌任江宁巡抚,以远略治理江南,百姓称“旱魃为虐,公来雨作”。康熙年间,江南历经战乱,官场奢靡,豪强兼并,赋税繁重、水旱频发、文教凋敝、民多流亡。汤斌到任后,以身体作则倡导节俭,“日给惟韭菜一束”,被百姓称为“清汤”。他以清廉整飭吏治,严惩贪墨豪强,上疏请求减免江南苛捐杂税,迅速缓解百姓当下之困。更可贵的是,他着眼江南长远发展,推行固本兴远之策:兴修水利,疏浚吴淞江、白茆塘,修建堤坝数十座,根治水患、改善灌溉,让万顷农田得以保收;创办书院,弘扬儒学,聘请名师讲学、设立“助学田”,让贫困子弟皆有书可读;设立“乡约”,每月宣讲伦理道德,化民成俗,让好勇斗狠之风变为邻里和睦之象。在他的治理下,昔日荒废的学校“学子满座,琅琅书声不绝”,江南文教兴盛、民生安定。后来,汤斌被提拔为礼部尚书,离任之时,百姓纷纷上前痛哭着挽留,整条街巷都被挤满了,百姓哭道:“公在吴,水旱不害,盗贼不生,愿公留!”

陆陇其是清代又一位以远功惠民祉的官员。他任嘉定知县时,嘉定为财赋重地,豪强盘

剥、胥吏贪腐、赋役繁重,百姓苦不堪言。陆陇其摒弃“重赋求功”的短视之策,“抑豪强、裁冗役、禁侈靡、清核田亩、均平赋役”,不到两年便“夜不闭户、囹圄空虚”。他深知“教化是固本之策”,立社学、兴教化,亲为百姓讲《孝经》《小学》,让嘉定民风渐趋淳厚。后来,因拒绝迎合巡抚慕天颜,陆陇其被诬告“讳盗”(即隐瞒盗案)而遭罢官,百姓闻之“罢市三日,万人执香挽留,塞途遮道,哭声震天”。临行时,其行李仅“图书数卷、夫人织机一架”。任灵寿知县时,陆陇其亲赴深山勘查灾情,“捐俸赈灾,恳请朝廷减免钱粮”,剔除流亡人丁名额以轻民负,更推行乡约、兴办学堂,让灵寿百姓知礼义、明廉耻。离任时,灵寿百姓立碑铭记其遗爱,攀辕相送,胥吏亦垂泪不舍。百姓为其立生祠祭祀,陆氏后裔世代守墓,当地百姓称其子孙为“恩公之后”。康熙皇帝赞其“本朝理学儒臣第一”,雍正二年(1724),陆陇其获准从祀孔庙;乾隆元年,朝廷赐谥“清献”,这份身后殊荣,正是其功惠民祉的最好见证。

从汤斌抚吴获“旱魃为虐,公来雨作”之颂,到陆陇其治县得百姓生祠永祀,世人对谋远固本、洁己爱民贤吏的称颂,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。《管子》有云:“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”远以利民,是为官者摒弃短视、扎根民生的治政智慧,彰显的是不贪近功、筑牢根基的实干担当。为政者唯有常怀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境界与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,以长远眼光谋政、以固本举措安民,方能让政绩经得起历史与百姓的检验,让百姓口碑隽永流芳。

《尚书·泰誓中》云: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”百姓的眼睛,就是上天的眼睛;百姓的声音,就是上天的声音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,百姓是最好的评判者。今天,当我们谈论政绩时,不妨回到百姓的口碑中寻找答案。真正的政绩,不在汇报材料里,不在宣传报道中,而在百姓的笑脸上,在民间的歌谣里,在后人的感念中。为官者当以“廉、勤、公、远”为镜,以百姓之心为心,以为民之举筑绩,因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,口碑是最好的政绩。



溯源古人消暑法

伊羽雪

夏日炎炎,暑气蒸腾,今人有空调、风扇、冷饮相伴,消暑纳凉更加便捷。在没有现代电器的古代,面对酷暑炙烤,古人凭借智慧与巧思,摸索出诸多消暑妙法,既取材自然,又雅致实用,在漫长岁月里,撑起一方清凉天地。

临水纳凉,是古人最朴素的消暑之法。古人深谙“近水生凉”的道理,常择河畔、池边、溪畔避暑。盛夏时节,文人雅士多临水而居,或临池静坐,或溪边漫步,清风拂水,凉意自生。东晋王羲之常与友人在兰亭溪水边曲水流觞,临水谈话,借水意驱暑气;唐代诗人杜甫偏爱在江畔茅舍消暑,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”,写尽临水纳凉的悠然。普通百姓则常在河边、井旁歇息,掬一捧清泉洗脸,坐于树荫闲谈,水汽氤氲间,暑气便消散大半。

筑室纳凉,尽显古人的建筑智慧。为避酷暑,古人建房极重通风遮阳,讲究“敞廊、疏窗、深檐、厚壁”。富贵人家建有专门的消暑居所,名曰“凉室”“冰室”,墙壁加厚,窗户窄小,阻挡烈日直射,屋内搭建架空地板,隔绝地面热气。更有精巧的凉殿,以流水循环降温,唐代皇宫中的含凉殿,借水力驱动水车,将冷水输送至屋顶,水流沿檐而下,形成水帘,风裹挟水汽灌入殿内,清凉如秋。普通民居则多开南北窗,形成穿堂风,屋檐加宽,遮阳避晒,屋内摆放竹席、瓷枕,凉意顿生。

着夏衣、戴凉饰,是古人最直接的防暑妙法。古人夏日多穿麻、葛、纱等轻薄透气的衣物,宽松通透,散热吸汗,虽无华饰却清爽宜人。男子常戴凉笠、凉巾,女子簪戴茉莉、栀子花,既可遮阳,又添清香。市井百姓更喜赤足、敞襟,顺应时节,以最自然的方式散热避暑,简约又实用。

食粥饮茶,为古人消暑养生之道。盛夏酷热,脾胃虚弱,古人便以清淡饮食消暑,常煮绿豆粥、荷叶粥、薏米粥,清热健脾、生津止渴;又喜饮凉茶,以金银花、菊花、薄荷、藿香煮水代茶,清香解暑,提神醒脑。古人讲究不贪冰寒、温养消暑,既解酷暑,又护身体,是流传千年的养生智慧。

用冰消暑,自古便是消暑良方。古人藏冰历史悠久,早在周代就设有专门官职“凌人”,负责冬季凿冰、储存,供夏日使用。他们在地下深挖冰窖,用稻草、糠壳隔热,将冰块封存其中,待盛夏取出使用。贵族人家会在室内放置冰盆,冰块融化吸热,降低室温,如同天然空调;宴席上则有冰盘、冰盏,冰镇瓜果、美酒,食之清爽解暑。宋代市井已有专门卖冰的商铺,冰雪冷元子、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等冷饮盛行,百姓也能尝得冰品凉意。古人用冰消暑,雅致又高效。

利用植物消暑,是贴近自然的消暑妙方。古人喜在庭院、窗前种植消暑植物,既遮阳又添凉。庭院中多植梧桐、柳树、芭蕉,枝叶繁茂,绿荫匝地;窗前摆放荷花、茉莉、薄荷,花香清雅,沁人心脾,薄荷叶片揉碎涂于肌肤,清凉止痒。古人还常采摘荷叶、竹叶,制作消暑饮品,荷叶粥、竹叶茶,皆是传统消暑佳饮,清热解暑,温润养人。

利用器物消暑,藏着古人的生活巧思。夏日里,竹扇、蒲扇是家家必备的消暑器物,轻摇扇面,清风徐来,轻便又实用。瓷枕、竹席、藤椅更是消暑三宝,瓷枕冰凉沁骨,竹席、藤椅透气散热,坐卧皆凉。古人还会将瓜果、茶水放入竹篮,悬于井中用井水镇凉,取出食用时冰凉可口。

焚香消暑,以雅趣驱暑气。古人夏日常焚清凉香药,如沉香、檀香、藿香、冰片,香气清雅,



宁心安神,正所谓“心静自然凉”。文人雅士在书斋焚一炉清香,临帖作画,读书品茗,香气萦绕,暑意全无。这种消暑之法,不重物降温,而重心境清凉,尽显古人的雅致情怀。

从临水筑室到藏冰用水,从植物消暑到器物纳凉,古人的消暑之法,无一不取自自然,无一不藏着智慧。没有现代科技的加持,他们以巧思应对酷暑,在炎热夏日里寻得清凉,活出闲适与雅致。这些古老的消暑方式,不仅是生活的智慧,更是传统文化的瑰宝,让今人在回望之际,依旧能感受到那份穿越千年的悠然与清凉。

“戴高帽”的高帽是什么帽子

许晖

语词精奥

只要是中国人,都知道什么叫“戴高帽”,但如果认为“戴高帽”是一个只具备比喻意义的日常俗语,那就大错特错了,在古代,戴得高高的这顶帽子,可是实实在在的帽子。

《北史·儒林传》记载,有一位叫宗道晖的儒士觉得自己学问很大,足以傲视别人,装扮也一定要和别人不一样。他的装扮是:高翅帽,大屐——头上戴着帽翅很高的高翅帽,脚上穿着形制宽大的鞋子。州官上任的时候,他就这一身打扮去拜见,“自言学士比三公”。清人翟灏《通俗编》一书引述了这条史料后,加了个注解:“今谓虚自张大,冀人誉己者,曰好戴高帽子,盖因乎此。”可见,“戴高帽”这个俗语迟至清代乾隆年间就已经成形了。

宗道晖戴的高翅帽可以追溯到乌纱帽。乌纱帽是南朝宋明帝时期刘休仁改制的一种便帽,做法是“反抽帽裙”而成。“帽裙”是帽檐上面下垂的绢帛,用来遮挡风尘,“反抽”就是把它往上翻起,像鸟儿的翅膀。“乌纱帽”最初通行于民间,无论官吏、百姓,不分贫富皆可佩戴,后世才逐渐演变为官员专属官帽的代称。

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,《隋书·礼仪志》载:“宋、齐之间,天子宴私,着白高帽,士庶以乌。其制不定,或有卷荷,或有下裙,或有纱高屋,或有乌纱长耳。”南朝的宋、齐时期,皇帝举行宴会的时候,自己戴的是白色的高帽子,百官和老百姓则只能戴黑色的帽子。这些帽子的形状没有一定之规,《隋书·礼仪志》

中描述了四种样式:第一种,“或有卷荷”,卷荷指含苞欲放的荷花,帽子顶上是圆形的,就像含苞欲放的荷花,因此叫“卷荷帽”,又叫“莲叶帽”;第二种,“或有下裙”,帽身带有向下垂坠的帽裙;第三种,“或有纱高屋”,用纱做的就像有着高高屋顶的帽子,这种帽子也叫“高屋帽”;第四种,“或有乌纱长耳”,用乌纱做的就像有着长长的耳朵一样的帽子。

乌纱帽正式成为官员身份标识,最后定型为官员的惯常装束是在明代,《明史·舆服志》记载:“凡常朝视事,以乌纱帽、团领衫、束带为公服。”“常朝”指百官对皇帝的一般性的朝见,在这样的场合,官员们都以头戴乌纱帽、身穿团领衫、腰间有束带的这种装扮为官服。

乌纱帽虽然是官帽,但其实并不高,所以又称之为“乌纱矮冠”。到了明代中叶,风气大变,乌纱帽开始高起来。顾起元在《客座赘语》中描写兵部尚书王敬“身短,纱帽作高顶,靴着高底,舆用高杠,人呼为‘三高先生’”。王敬因为个子矮,就把乌纱帽做成高顶,靴子垫着高底,坐的轿子用高高的杠子抬。

清代学者俞樾曾记录过一则著名的笑话《戴高帽》,读来令人捧腹。有一名京官要到外地做官,去向老师辞行。老师嘱咐说:“外官不容易做,要谨慎。”这人答:“不怕,我备有高帽一百顶,逢人便送一顶。”老师大怒说:“我辈以正直之道立身,何须如此!”这人答:“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喜卿者,能有几?”老师点头道:“这话倒是没错。”这人出门后对旁人说:“我原有高帽一百顶,如今只剩九十九顶了。”